

高增德
丁东
编

世纪学人

自述



他们
构成了一幅
20世纪
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
全景图

他们的心路历程
集中地
浓缩着
民族的精神历程

学者集体的心路
就是民族的心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六卷

高增德丁东编

立
紀
學
人
自
述

費
孝
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学人自述: (第六卷) / 高增德, 丁东编.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2-0560-9

I. 世… II. ①高…②丁… III. 学者-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314 号

世纪学人自述 (第六卷)

SHIJI XUEREN ZISHU

高增德 丁东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5 印张 377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7-5302-0560-9

I·452 定价: 21. 00 元

序 言

高增德 丁 东

20 世纪快要结束了。在告别 20 世纪之时，我们把这套六卷本的《世纪学人自述》奉献给读者。

本书是二百位社会人文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全景图。有人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民族的大脑，那么社会人文学者，应该是民族大脑中最具有理性的部分。他们的心路历程，自然集中地浓缩着民族的精神历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学者群体的心路，就是民族的心路。

进入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显学。反思本世纪中国人走过的道路的书籍，也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就知识界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社会关注；就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理性的觉醒。在行将步入新的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具有反思历史的自觉，认真回顾一百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前瞻 21 世纪的进程。

由中国古代的学术与西方的近代学术碰撞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诞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展至 30 年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学科分类

和相当的研究规模，产生了诸多的学术流派和富有活力的学术传统，出现了一批堪称一流的研究成果。然而，到 50 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失去了自身的特点，被改造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有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在“反右”以后干脆被取消。到了“文革”时期，文、史、哲、经，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工具，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喇叭筒，不管是有名无实的学科，还是无名无实的学科，到此已经停止了学术生命。直到 70 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社会人文学科才得以起死回生。各学科的重新建设大约开始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大体上已经全面铺开，过去有过的学科又都恢复了，国际上有而中国没有的学科也建立了，甚至一些中国独有的学科也产生出来。然而，比起学科的恢复，学者的人格和学术自信的恢复，大约还要晚十年。老一代学人经过“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生存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哪还有健康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到了 80 年代初，心态还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下子找不回当年的学术自信 and 风采。中年一代的学者从教条主义的阴影下挣脱出来，想要冲破思想的牢笼，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直到 90 年代，“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才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身体力行。内伤的深重，使中国社会人文学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才重新与曾经有过的学术传统接轨，同时敞开怀抱，呼吸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八面来风，使得社会人文学术重新走向兴盛。收入本书的二百位学者自述，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曲折的发展轨迹和坎坷的奋斗历程。

本书的启动，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底。当时高增德筹备创办《晋阳学刊》杂志，设计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

栏，向健在的老年学者约组自传，同时也请学生和亲属为先哲立传。当时的着眼点，首先是抢救史料。那些成名于 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学者，一部分没有熬过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已经过早地辞世，健在者也年逾古稀，乃至过了耄耋之年。请他们留下第一手的叙述，成了当务之急。有的学者年老体弱，已经不能执笔，只好口授整理。有的学者刚刚写完自述，就驾鹤西去。这二百位传主，一半以上已然作古。这些自述的成稿年代不一，其中有一部分完成于 80 年代初期，当时有的传主经过多年失语，尚未完全恢复学术自信。如果晚几年写，他们的思想可能更为解放。然而，自然规律又不容许我们等待。所以，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免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大病初愈的特点。虽然今天的读者可能感到不尽如意，但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价值。一些学者心态逐渐开放，后来撰写的自述，就不只具有史料性，同时具有现实的思想性了。因为是自传和他传同时组稿，有些重要的学者，当时有他人为之作传，所以没有约写自传；因为本书纯属民间行为，有些重要的学者，没有联系上。这些缺欠，只好等本书有进一步扩大规模或增编续集的机会时来弥补。

本书的编排，以传主的年龄为序，而不按传主从事的专业分类，主要不是因为有些传主跨越几个专业，不好分类，更重要的是希望形成一种历史感。那些出生于上个世纪末，亲身感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是第一代；出生于本世纪前一二十年，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是第二代；出生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学术活动的是第三代。虽然每位学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同代人的命运却有颇多相似之处。学术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聪明才

智的发挥，很难不受这种大环境的制约。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感喟。本书的传主，以第二代为多。而一些第一代的学者自述，当时没有抢救得到，不免留下永远的遗憾。

这些自述，对于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有独特的价值。本书的大部分传主，在本学科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自述，反映了那个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学理，讲述了他们的师承、交流和治学经验，这是学术史方面的价值；这些学者还叙述了求学的经历，早期的讲到旧式的私塾和本世纪最早的新式学堂，一些人讲到留学的经历，许多学者还有执教的经历，这是教育史方面的价值；其中一些学者参加本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思想论争，有的还是论争中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回忆，为思想史留下了重要的证言，这是思想史方面的价值；在 20 世纪中国，学人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也曾在全能政治的环境中，失去了独立的社会角色，这些自述，反映了学者阶层的命运变化，这是社会史方面的价值。

最近几年出版的学者传记、年谱或评传日渐其多，但我们还是感到自传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自传、日记、书信都是第一手资料。虽然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也需要辨析，但毕竟是其研究工作的原始依据。没有原始材料做基础，其他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这就是我们格外看中自述价值的理由。书中多数自述附有著述目录，均按原貌刊印，未求格式统一。

这些文稿的出版经历了许多周折。80 年代初，就有一家出版社与高增德合作开展这项学术工程。先是面对僵化思想的禁锢，审稿每每遇到阻力，后来又面对市场压力，严肃纯正的学术书籍印数骤减，再加上当时经验不足，过于相信君子协

定，该出版社易人毁约，使这项学术工程半途而废。多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慧眼识珠，诸位编辑鼎力推动，使得这套《世纪学人自述》得以面世。在此我们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虽经努力，我们至今尚未与一些作者取得联系，恳请这些作者或家属尽快将通讯地址告诉出版社，以便奉寄稿酬。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费孝通先生题写书名，感谢那些提供自述的学者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与宽宥。对于一百多位故世的传主，我们只能追怀他们的成就与业绩，把他们的告白传诸后人，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目 录

- | | |
|---------|-------|
| 【 1 】 | 何兆武自述 |
| 【 7 】 | 江 地自述 |
| 【 22 】 | 霍松林自述 |
| 【 36 】 | 罗克汀自述 |
| 【 48 】 | 胡 华自述 |
| 【 54 】 | 唐振常自述 |
| 【 127 】 | 李 洵自述 |
| 【 137 】 | 蒋孔阳自述 |
| 【 145 】 | 陶懋炳自述 |
| 【 160 】 | 邓子基自述 |
| 【 167 】 | 林增平自述 |
| 【 177 】 | 孙越生自述 |
| 【 186 】 | 王运熙自述 |
| 【 203 】 | 茅家琦自述 |
| 【 229 】 | 高 敏自述 |
| 【 268 】 | 王尔敏自述 |
| 【 291 】 | 王元化自述 |
| 【 297 】 | 戴 煌自述 |
| 【 319 】 | 张恩慈自述 |
| 【 339 】 | 敢 峰自述 |

【347】	高清海自述
【360】	邢贲思自述
【384】	孙广德自述
【399】	李泽厚自述
【405】	陈 辽自述
【424】	李学勤自述
【431】	赵 诚自述
【440】	邵燕祥自述
【457】	严家炎自述
【476】	张立文自述
【496】	谢本书自述
【509】	索 引



何兆武自述

我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9月全家间道南返故乡，在长沙入中央大学附中（由南京迁校）；1939年毕业，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1946年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1946—1949年任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1949—1950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1950—1952年北京图书馆编目员，1952—1956年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1956—1986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1980年曾兼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访问美国学者，1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1986—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3—1994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1995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我自己幼儿时正值军阀混战，但北洋时期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和后来的国民党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难忘。其后做小学生时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九一八以后无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学时，全民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是不断的颠沛流离。上大学时是欧战，继而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读

研究生时，二战结束。或许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和连年战乱所引发的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感触和思索，使我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

求学时期许多师友的启发和虽在战时却仍然相当丰富的图书与便利的阅读条件，容许我经历了相当长一段难忘的时光。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之时，却往往能得到精神上无比的启蒙之乐。当时的校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给了学生们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转系、自由旁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同学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转过四个系，曾旁听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文学与人生，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和其他的课程和讲演；这些都不是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同学好友中王浩和郑林生都曾对我的思想有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专业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他们的谈话和思路每每给我以极大的启发。在专业上，葛邦福老师（J. J. Gapanovitch）则是引导我对历史哲学感兴趣的指路人。

解放后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我参加了侯外庐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他的助手工作了三十年。我以为侯先生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是决不把思想史讲成是思想本身独立的历史，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当成是现实生活的产物，然后才是它从前人的思想储备库中汲取某些资料、方法和智慧。这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之所在，即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然而 60 年代所风行的观点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强调思想领先，把事情说成是思想在决定一切的存在，历史是沿着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当时各种运动、劳动、社会活动和不务正业的各种业务连接不断，

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时间，自己的专业也就无从谈起。

因为对西方思想史也甚感兴趣，所以不时也偷暇翻阅一些，这在当时是被认为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厂的。偶然得到了 Halbwachs 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注释本。卢梭的书已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响，而居然没有一个可读的中译本，更不用说注释本。于是我又找来几种名家的注释本和 Vaughan 的权威本，除了翻译本文之外，还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来已前后修订过三次。

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为实际上是两大主潮的互相颀颀，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辟的“以脑思维”的路线，另一条是由巴思迦所开辟的“以心思维”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并不违反科学，巴思迦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但我国的研究者几乎从不提及巴思迦的名字。我恰好有一本 Brunschvicg（巴思迦）的权威本，所以又偷译了他的《思想录》，并找了几种注释本，也做了一点集注和诠释的工作。在我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领域，我以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迄今仍不失为西方最深刻、最有价值的著作，所以斗胆在“文革”期间备尝艰苦地把它译了出来。以后又译过几部书，大都是由于偶然，兴之所至，自己选译的。但其间有两部书是当事人来找我译出的。一部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找到了我，当然是由于我在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的缘故。另一部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遭遇则颇有点戏剧性了。

50 年代罗素曾起劲地大搞和平运动，颇受我国当局的赏识。因此毛和周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已欣然同意。但临行时，高龄已九十有余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克远行。罗

素乃以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赠毛，毛遂转交下面译出。当时这类书籍是由商务印书馆分工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便找到了我。（这事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骆静兰学姐亲口告我的。）我虽也有兴趣，但嫌全书过长，译完第一部分之后，便辞掉此事。“文革”中，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之后，批斗我的罪状之一就是，我翻译此书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以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之权威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本人，可谓开万国亘古未有之奇，使我只敢窃笑而不敢明言。

“文革”以后，时间较多，研究环境也较前宽松，几次出国，也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未能见到的书和材料，于是又动手翻译了几部书，也写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书中和文集中。近代中国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 19、20 世纪的中国还在补西方 18、19 世纪的课。把历史学认同于科学，就是在思想上补 19 世纪实证主义的课。我以为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所以它必须服从科学而不能反科学），又有非科学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实验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要求为尽历史学之能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和人文学科）还另有其自己独特的纪律、规范和准绳（criterion）。我希望有人能把它写出来，我自己也愿意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即历史）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人性当然包括阶级性在内，但阶级性并不能穷尽人性。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个物种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惟独对于文科来说（如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

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中国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著作：《中国思想发展史》（合作）、“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近代西方思潮》、《苇草集》、《学术文化随笔》。

参加侯外庐先生主编下列各书的撰写工作《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国哲学简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史纲》。

编纂及校订：侯外庐《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马克思《读罗马尼亚史手稿》、《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王重民《徐光启》、利玛窦《中国札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七卷“历史哲学”）。李泽厚《Discourse on Zhuang Zi and Chan Buddhism》。

翻译：库尼茨基《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社会契约论》、罗素《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史》、《论历史》、帕斯卡尔《思想录》、《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李约瑟《中国科学思想史》、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永久和平论》、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梅纳克《德国的浩劫》、盖伦《科技时代的心灵》、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伊格尔斯《二十世纪

的历史科学》、柏克《法国革命论》、劳拉·费米《费米传》、孔多赛《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贝克尔《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近代西方史学理论选》、《人类的故事》、房龙《人类思想解放史话》。

论文、杂文及译文若干篇。

1998 年



江 地 自 述

江地，原名李广澎，现在的名字是原来的笔名，山西省沁水县中村人，1921年9月19日生。现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人，仅在抗日战争前夕，读过一年半初中就失学了，再没有机会深造，只好去当教师，借以糊口维持生活。我曾经当过五年小学教师，十年中学教师，1956年到大学教书，如今也已二十八年了。教书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所谓教学相长，即是此意，而且必须学懂教好，不然就会在课堂上出丑，这样年年月月地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文化水平就慢慢提高了。小学我从四年级教起，教完了一年，看看五年级的课程也可以教了，就去教五年级，然后是六年级，再然后是教中学。教中学也是从初中一年级教起，然后再教二年级，三年级，这样循序渐进，比较有把握，比越级而教的办法稳妥，就这样一步一个台阶，又从大学一年级教到四年级，然后再给研究生讲专题课，培养硕士研究生。我因为是从中学调到大学教书的，没有当过助教，却当过讲师、副教授，再当教授。这种办法，对于今日的青年教师，并不完全适用，但学习应该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却是具有共同性的。这对于那些想通过自学途径，来进入专业领域的同志们来说，也许是可以参考的。